

斯大林語言學著作中 所闡明的語言與方言學說

蘇聯 阿瓦涅梭夫 著

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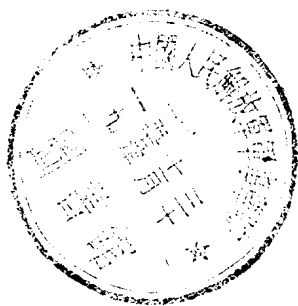




2 027 5887 2

斯大林語言學著作中 所闡明的語言與方言學說

蘇聯 阿瓦涅梭夫 著
李 佩 娟 譯



民 族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書號：491(1)021

**斯大林語言學著作中
所闡明的語言與方言學說**

蘇聯 阿瓦涅梭夫著

李佩娟譯

民族出版社出版

地址：北京國子監特五十四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

中央民族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787*1092*1/32 27千字 印張1 $\frac{1}{2}$

印數：1—10,000冊 定價：六分

斯大林語言學著作中 所闡明的語言與方言學說

蘇聯 阿瓦涅梭夫 著
李 佩 娟 譯

民 族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Р. И. Аванесов
УЧЕНИЕ О ЯЗЫКЕ И ДИАЛЕКТЕ
В СВЕТЕ ТРУДОВ И. В. СТАЛИНА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譯自“斯大林著作中所闡明的語言學問題”(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 СВЕТЕ ТРУДОВ И. В. СТА-
ЛИНА) 莫斯科大學出版社, 1952。

2611/25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天才著作，不僅是蘇聯語言學發展中的一個轉折點，並且在理論方面也是近代最重要的一件世界大事。斯大林的天才新著作是創造性地運用和進一步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無與倫比的典範，具有一般理論上的巨大意義。

斯大林的這些著作包含有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語言學說的完整的體系。這些著作不但揭穿了馬爾的所謂『語言新學說』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同時也解決了語言學上一切基本的和最複雜的理論問題。斯大林的深刻而明白的，準確而精微的公式，肅清了至今還籠罩着語言學界的荒謬絕倫的混亂狀態，特別是在所謂語言『新學說』的代表人物——馬爾的『門徒們』及其追隨者們中間。

語言學問題，特別是關於民族語言的形成問題，早在過去幾十年裏，就是列寧和斯大林所共同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和民族問題學說的理論注意範圍，因為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語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斯大林在自己許多民族問題的著作中，特別是在這些經典著作中，如『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及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等，對民族語言的形成提供了天才的理論，可惜，語言學者還很少去運用。

因此，很自然的，在斯大林特別有關語言學問題的著作

中，以很大的地位討論民族語言形成的問題，並且廣泛地討論到方言和語言形成的問題。正如斯大林所指示的一樣，民族語言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通常是在這種或那種地方方言的基礎上形成的。

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對於各歷史時期方言和語言的形成，提供了完整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為蘇聯語言史家真正的語言的歷史研究開闢了寬闊前途。

二

斯大林所創立的天才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學體系的各個方面，是彼此密切聯系着的，是互相貫通的。斯大林教導說，語言是社會現象，語言的發展密切聯系着社會的發展，密切聯系着使用和創造這種語言的人民的發展：『語言是屬於社會現象之列的，從有社會存在的時候起，就有語言存在。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語言也將是隨着社會的死亡而死亡的。社會以外，無所謂語言。因此要了解某種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聯系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聯系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①

但是，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語言，正如斯大林所教導的，同時並不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築：『……語言既不可以列入基礎一類，也不可以列入上層建築一類。』^② 斯大林關於語言和方言的學說中最重要要素，就是從這個基本的和最普遍的原理中推論出來的。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二〇頁。

② 同上，第三五頁。

語言和上層建築不同，上層建築是同一經濟基礎存在着和活動着的一個時代的產物，而語言則『……是許多時代的產物，在這許多時代中，它形成起來、豐富起來、發展起來、精鍊起來。所以語言的生命是比任何一個基礎、任何一個上層建築的生命都長久得無比。這就是爲什麼不僅一個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產生與消滅，而且好幾個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產生與消滅也不會使得在歷史上消滅一種語言，消滅一種語言的結構和產生具有新的詞彙和新的文法構造的新的語言。』^①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語言和它的結構不能看作某一個時代的產物。語言的結構，以及它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許多時代的產物。』

可以推想現代語言的要素還在奴隸時代以前的遠古時期就已奠下基礎了。』^②

關於語言不是上層建築這一原理是和另一個重要原理密切相連的，即按照後一原理，語言不是階級性的現象，而是全民性的現象。事實上，如果說語言是上層建築，那麼它就與一切的上層建築一樣，是階級性的現象。斯大林已經指出語言不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築，並且指出語言的『階級性』的公式是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公式：『語言作爲交際的工具從來就是並且現在還是對社會是統一的，對社會的所有組成員是共同的。』^③ 斯大林確鑿的證明：『……語言作爲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同樣地替社會一切階級服務。在這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五——六頁。

② 同上，第二四頁。

③ 同上，第一九——二〇頁。

一方面語言表現出對於社會各個階級是一視同仁的。』^㉑

斯大林不止一次強調指出，關於語言沒有階級性而是全民性的原理是從屬於語言不是上層建築這個原理的。斯大林教導說，每一個基礎有適應於它的上層建築。如果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那麼它的上層建築也就會隨着變化和被消滅。如果新的基礎產生，那麼也就會隨着產生適應於新基礎的上層建築。

斯大林說：『在這一方面，語言是與上層建築根本不同的。語言不是一個社會內部這一種或那一種舊的或新的基礎所產生，而是千百年來社會歷史全部進程和基礎歷史全部進程所產生的。語言不是某一個階級所創造的，而是全社會、社會所有各個階級、幾百代的努力所創造的。語言的創造不是爲了滿足某一個階級的需要，而是爲了滿足全社會的需要，滿足社會所有各個階級的需要。正是因爲如此，所以創造出來的語言是全民的語言，對於社會是統一的，對於社會所有組成員是共同的。因此，語言作爲人們交際工具的服務作用，不是替一個階級服務而損害另一些階級，而是一視同仁地替全社會服務、替社會所有各個階級服務。這也就是爲什麼語言可以一視同仁地替舊的衰亡的制度服務，也替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務；可以替舊基礎服務，也可以替新基礎服務；可以替剝削者服務，也可以替被剝削者服務。』^㉒

因此，正如斯大林所指示的，語言表現出對於社會各個階級是一視同仁的。『但是人們、個別的社會集團、個別的階級對於語言遠不是漠不關心的。他們極力設法利用語言爲

㉑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一〇頁。

㉒ 同上，第三——四頁。

自己的利益服務，把自己的特別的詞彙、特別的術語、特別的用語，強加到語言中去。在這方面，那些脫離人民並且仇視人民的有產階級上層，如貴族、資產階級上層份子表現得特別厲害。他們創造「階級的」習慣語、同行語、客廳「語言」。在有些著述中常常把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錯誤地當作語言，如「貴族語言」、「資產階級語言」以及與之對立的「無產階級語言」或「農民語言」、很可怪的，我們有些同志竟以此為根據，作出什麼民族語言是虛構，真實存在的只有階級語言的結論。』①

斯大林說：『……這樣的結論是極端錯誤的。』②

『階級的』習慣語或同行語都不能認作是語言，『……語言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語言的基礎，是語言特點的本質』③。而這些『階級的』習慣語、同行語都沒有自己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語言完全是為整個社會服務的，然而這些階級的習慣語、同行語只是在某一個階級內部，主要是在某一個階級上層分子的狹窄範圍內通用。因此它們沒有任何語言的獨立性，並註定不能有所發展；它們不能發展為獨立的語言，不能排擠民族語言，不能代替民族語言。如果不是這樣想法的話，斯大林說，『這就是喪失歷史前途和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立場』④。

地方或地域的方言則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斯大林把它和『階級的』習慣語、同行語截然地區別開來，並認為地方方言在民族語言形成的歷史中具有極重大的意義：『相反地，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一〇——一頁。

② 同上，第一一頁。

③ 同上，第二四頁。

④ 同上，第一一頁。

地方（「地域」）方言，是替人民羣衆服務，並且有自己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因此，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過程中可以成爲民族語言底基礎並發展爲獨立的民族語言。』^㉑

大家知道，地域方言正是方言學的科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斯大林關於它在民族語言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的指示，提高了作爲科學學科的方言學的意義，特別是歷史方言學在建立語言歷史中的意義，並同時要求我們在研究某些現代方言時，須有深刻的歷史主義觀點。

馬克思主義對各種方言及語言研究的態度，要求我們十分明確的回答語言在其發展過程中怎樣變化的這一問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馬爾及其『門徒們』和追隨者們製訂了所謂語言發展的階段論，斷言發展的進程是突變式的，從舊質過渡到新質是以爆發的方法，以破壞舊語言創造新語言的方法來實現的。斯大林指出這是荒謬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它是由語言似乎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築這一荒謬前提產生出來的。

而實際上，語言不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築，它的變化也不同於上層建築的變化。

斯大林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認爲語言從舊的質到新的質的轉變不是經過爆發，不是經過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而是經過新質的要素的逐漸積累，也就是經過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㉒

『馬克思主義不承認在語言發展中有突然的爆發，有現存語言的突然死亡和新語言的突然創造。』^㉓ 因此，斯大林

㉑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四三——四四頁。

㉒ 同上，第二六頁。

㉓ 同上，第二五頁。

說，在馬爾的語言發展的階段論中很難找到多少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融合論是與語言發展的階段論密切聯系的，它是馬爾及其『門徒們』所大事吹噓的好像是語言『新學說』的卓越成就，斷言各語言的融合彷彿就是新語言的質的發展的主要途徑。語言融合論是從不分皂白地否認語言系族出發，認為新語言的形成是以爆發的方法由於非親屬語言的融合，『匯合』的結果。斯大林證明：『兩種語言融合並不產生什麼新的第三種語言，而是其中的一種保存起來，保存它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並使它能按其內部發展規律繼續發展着。』[⊖]斯大林所論述的天才原理和馬爾的融合論相反，認為語言是按其內部的發展規律，向前發展着和改善着的。

『語言學的主要任務是在於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如果這一點是對的，那就應當承認，語言融合論不僅不能解決這個任務，甚至沒有提出這個任務，——它簡直是忽視這個任務，或是不懂這個任務。』[⊖]

三

總之，語言不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築；語言不同於上層建築，它不是某一個時代的產物，而是許多時代的產物；現代語言的要素還在奴隸時代以前的遠古時期就已奠立基礎；語言在它的歷史一切階段上都不是階級性的現象，而是全民性的現象；語言的發展是經過新質要素逐漸的長期的發展，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語言是按其內部的發展規律，

⊖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二八頁。

⊖ 同上，第二八——二九頁。

向前發展着和改善着的；地域方言爲人民羣衆服務，並在民族語言形成的歷史上有重要的作用。

這一切爲斯大林所首先製訂的原理，是互相密切關連着的，構成了一個統一和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些原理都彼此互爲依據，或相反地，而又能互相引伸。

根據這些原理不能不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任何一種現代民族語言都是它所經歷的複雜的歷史道路的產物，都是歷史所形成的，它的各個要素都可以追溯到不同的，而且往往是很古的時代。這一結論不僅涉及該民族語言的各種結構要素（語音、形態、句法、詞及詞義），而且也涉及它在地區上的各種變形——地域方言。

語言按照自己的內部規律發展着。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和社會歷史之間的聯系問題尙有待於研究。然而無可置疑的，各種方言的流行地區，和方言現象的地區的擴展，則取決於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

正是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深刻的歷史主義，消除了下面的這個原理中顯然是表面上的矛盾，即語言從來就是並且現在還是對社會是統一的，對社會組成員是共同的，同時却還存在着地方或地域方言。雖然語言從來就是全民的，對社會是統一的，對社會組成員是共同的，但是社會本身從原始公社制度時代起到現在爲止却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這些變化就不會不在語言上留下一些自己的痕跡，或某種『烙印』。

所以在研究作爲社會現象的方言中的語言發展時，應密切聯系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聯系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

我們知道民族語言和方言是屬於歷史範疇的。這就是說，它們不會永遠存在的，它們按照自己發展的內部規律改進

着，向前發展着，在長時期內服務於按其地域範圍和社會經濟結構均所不同的各個社會。這在現代各方言的相互關係及其地域分佈當中反映出來了。

列寧早在一八九四年關於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問題就這樣寫過，理論『……作出了社會經濟結構的概念。』它以對人類共同生活說來的一個基本事實——謀取生活資料的方法——爲出發點，從而提出了在某一特定謀取生活資料的方法影響下所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在這些關係（馬克思稱這種關係爲「生產關係」）的體系中指明了那種帶有政治、法律形式和某種社會思潮的社會基礎。根據馬克思的理論，每一種生產關係的體系都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有其本身的發生、機能和過渡到高級形式、變爲另一種社會結構的特殊規律。』^①

因此各社會經濟結構相互交替時代的社會發展規律，是極不相同的：在原始公社制度時代是一種規律，在階級社會又是一種規律。在各種不同的階級社會結構（奴隸制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的時代的社會發展規律也極不相同；同時社會發展規律在每一個社會經濟結構的範圍內的不同發展時期中，也是不一樣的。從本質上起變化的新的社會關係產生於社會主義社會。

各種社會經濟結構時代中的不同的社會發展規律性引起地域方面各親屬語言和方言的區分。某些時代主要是引起語言的分化，組成許多彼此相接近的語言，相反地，而在另一些時代，則發生它們的大規模或小規模的統一和匯合。因此，在某些時代主要是發生方言的分歧，而在另外一些時代

① 列寧：『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和司徒盧威先生著作中對民粹主義的批評』（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版，第一卷，第三九〇頁）。

則產生了方言的一致、方言分歧的消失、方言的統一、方言之被部族和民族語言所吸收等現象。

在某些歷史條件下，語言分歧的出現是富有生命力和有效果的過程，也就是說，它的存在是該時代的社會經濟關係所促成的。而在另一些歷史條件下却相反，語言分歧的出現則具有衰亡、殘存、退化的性質，也就是說和存在於該時代的社會經濟關係沒有聯繫，但却相反地繼續存在，雖然該時代已經存在着另一些調和方言分歧，促進方言統一的社會經濟關係。在後一種條件下，方言之所以存在，因為新的社會關係還沒有完全來得及或在可能的範圍內來吸收它們，把它們融化在適應新社會的統一的新語言中。

必須牢牢記住：語言是許多時代的產物，在每一個時代裏，它都是從過去時期的發展中被繼承下來的東西。這個被繼承下來的語言，特別是它的基本詞彙和文法構造，是按照它的發展的內部規律，慢慢地發展着，並且某種語言現象在一個地域上傳佈的廣泛或狹小，是以社會發展水平、具體歷史條件來決定的。

現在讓我們研究一下關於語言和方言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問題。

四

在階級社會以前的整個一段時期中的特點，就是人們生活於零散而孤獨的小團體中。甚至在階級社會以前的高級階段——氏族社會——各部落內的人口數，雖然已比過去時期增加得多，但也不大^①。各個人口稀少的部落都彼此分散在

① 例如恩格斯指出『美洲各部落的平均人數，在兩千人以下』（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北京第一版，第八七頁）。

廣大的領域上，佔着巨大的面積。同時這些單獨的部落與一定的多少明確固定的地域上的聯系也是很薄弱的。

原始公社制度時代，部落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一樣，每一個部落在語言上是統一的。斯大林有一句關於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的話，他說：『……那時語言對人們的整個集團是共同的，統一的。』^①

部落的不斷分裂和瓦解是氏族社會中部落發展的基本過程。每個部落依據人口增長和地域分隔的情況，分爲幾個部分，各部分本身又逐漸變成爲一個部落，於是就組成了近親的諸部落。由於部落的分解，它的語言也因而分解，又組成了新的近親的諸部落的語言。恩格斯認爲這個過程的特點是『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與新方言』。^②

應該着重指出，由於往昔統一部落的分裂而組成的新部落，恩格斯稱之爲『血緣親族』。親屬語言是與那些由於往昔統一部落語言的分裂而組成新的部落語言同時形成的。恰如近親部落有同一的來源——起源於從前存在過的某個部落一樣，近親部落的語言也有共同來源——起源於從前存在過的某種部落語言。

馬克思寫道：『不斷分化的趨向根源於氏族組織中的因素；必然的，在它們（即蒙昧和野蠻時期的部落）的社會狀態和佔領廣闊領土的情況下，這一不斷分化的趨向就加強了語言中形成差別的趨向。雖然口頭語言在其詞彙方面是相當穩固的，特別在語法形式方面更顯得穩固，但它不可能始終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九頁。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第一版，第八七頁。

不起變化。地方性的分隔，在空間方面逐漸導致語言差別的出現；這也導致利益的特殊化和完全的獨立。』^①

因此，在氏族制度時代裏，與社會成員分爲若干近親部落相適應的，存在着許多親屬的、共同來源的、文法構造與基本詞彙相近的部落語言。它們相互之間近似的程度，可能不一樣：它是受相應的部落之間的近親程度所制約的。

然而，應該注意到：作爲社會單位的部落，並不是最基層的單位，它是由於許多氏族的聯合而形成的。因此隨着氏族語言之統一成爲一個共同的部落語言，氏族語言就在這共同的部落語言中變成了方言。這就發生了語言與方言的對立，也就是部落語言和作爲部落組成員的氏族的方言之間的對立。這以後任何一個時代的地方方言都反映出過去語言的全民形式。根據這個一般的原理，部落語言中的方言可以溯源於很久以前曾經存在過的氏族語言。

關於語言與方言在以後各階段中的發展，斯大林曾以下述的原理加以闡明：『至於語言的繼續發展，從氏族語言到部落語言，從部落語言到部族語言，從部族語言到民族語言，在所有這一切階段上，作爲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的語言是全社會統一的、共同的，是對社會所有組成員同樣服務的，而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怎樣。』^②

此後，由於社會的氏族組織的瓦解，產生了近親部落聯盟。同時，因爲建立了近親部落聯盟，也就發生了聯盟中的近親部落語言的統一。

在近親部落聯盟的共同的和統一的語言中，各部落的語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九卷，第七九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二版，第九頁。